

试论印度的地区研究:以公立大学为例

钱雪梅

内容提要 地区研究是印度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印度地区研究的学科设立和发展都由政府主导,学校和研究机构本身的自由空间相当有限;重视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相对较弱,但理论的觉醒和反思已经出现;其研究覆盖地区范围广,每个地区都有数量不等的专家,但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很少见;印度学者正积极谋求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包括学术影响力、毕业生国际化就业等。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印度 地区研究 公立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

一般而言,一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往往需要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学科发展方面直接体现为该国外国问题研究的快速成长,表现为研究队伍的明显扩大、研究成果数量急剧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和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都表明了这一点。从1947年独立起,印度便立志做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地区研究也同时启动。当前,印度处于其独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也进入大发展阶段,积极参与重塑国际体系的政

* 钱雪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治实践之中。^① 本文的任务是勾勒印度地区研究的基本情况,为今后相关研究奠定初步基础。

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是“国际问题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关系。人们习惯于把国际问题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立分支领域,与国内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学科并列。但实际上,国际问题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几乎所有“学科”之中。与外国问题相关的“地区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在当前中国,狭义的“地区研究”还主要相对于“大国研究”而言,一般专指亚非拉研究;广义的地区研究则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具体手段,即把辽阔的世界划分为若干地区和次地区分别加以研究。在此意义上讲,地区研究与“国别研究”类似。但与国别研究不同,“地区”的划分是人主观认识的产物,它可能是自然的地理区域,也可能是地缘政治区域。比如,欧洲、西亚非洲、南亚、东亚、中亚研究等属于前者;中东、近东、东欧、拉丁美洲研究等则属于后者。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种手段是“问题导向”,即以具体问题为主线或焦点,比如全球化、一体化、气候变化、跨界民族、移民、国际恐怖主义、边境走私、自由贸易、去全球化等等。地区/国别研究与问题导向的研究之间,有较大不同但又相互交叉。不同主要在于立足点和焦点,其交叉则在于:地区和国别研究必然围绕具体问题展开,而理想的问题研究则需要基于比较的意识和方法,需要覆盖相关若干地区或国别。

在印度语境中,地区研究是广义的,其“地区”并无特指,美国、欧盟和非洲都属于“地区研究”的范畴。印度的国际问题研究是从地区研究开始的。20世纪下半叶,地区研究一直是其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支柱,乃至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本身。印度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在回顾学科发展历程时,几乎都从地区研究说起。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才开始区分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印度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奠基人阿帕杜莱(A. Appadorai),认为,印度的地区研究可以追溯到1940年。目前,印度地区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学、智库和政府部门,相比较而言,智库的起步早于大学。大学的地区研究始于1950年代中期,而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ndian

^①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1&2, 2009, pp. 49-68.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CWA)在1943年便已成立。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专门以公立大学为例,^①管窥其地区研究的基本特点。但为表述方便,行文中可能称为“印度地区研究”。

论文分三个部分。首先简略介绍印度地区研究的基本状况,然后分析其主要特点,最后是结合中国的情况,对地区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一、印度地区研究的基本情况

1955年,德里大学设立非洲研究系和国际关系学院,这是印度公立大学系统启动地区研究的标志。1961年,德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脱离德里大学,独立为“印度国际关系学院”(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并迅速发展为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著名大学,研究领域覆盖欧洲、东南亚、南亚、东亚、西亚、中亚、美国、英联邦、苏联等国家和地区。1970年,印度国际关系学院并入尼赫鲁大学,改称“国际关系学院”(SIS)。1963年,印度政府决定在若干大学设立地区研究项目,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由此加快了机构建设。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提出规划,很快在各大学开设地区研究专业,奠定了当前大学体系中地区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 地区研究的机构建设

大学体系的地区研究机构建设,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整个结构包括两个层面,即联邦政府的管理部门、各大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二者直接相关,联系紧密。印度独立后实行计划体制,教育和公立大学的发展主要依据政府计划而行。地区研究项目作为大学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是政府推动建立和发展的。因此,地区研究的机制建设,首先而且关键在政府层面。

“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以下简称UGC)是联邦政府专门负责制定和管理大学发展规划的机构,初创于1945年。印度独立后,“大学资助委员会”仿照英国体制改建为政府常设机构,1953年12月完成改建,正式成立,依然称“大学资助委员会”,其主要使命包括:(1)促进和协调大学教育;(2)设立并维护大学的教育、考试和科研标准;(3)制定教育的最低

^① 印度自称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全国有550多所大专院校,学生900多万,教员40多万。大专院校包括公立和私立两类、四种: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ies)、各邦大学(State Universities)、视同大学(Deemed University)和私立大学(Private Universities)。

标准和规则；(4) 监管大学教育的发展，给大学和高等学校提供资助；(5) 担任联邦和各地方政府同高等教育之间的核心桥梁；(6) 就改进大学教育所必需的政策措施，向中央和各邦政府提出建议。^①

“大学资助委员会”对大学的管理是全面的。地区研究项目的启动和建设，都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为落实和推广地区研究项目，“大学资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1963年4月成立由西帕·拉奥(B. Shiva Rao)领导的“地区研究委员会”，负责落实在各地大学设立地区研究系的计划；二是1964—1966年“大学资助委员会”主任科塔里(Dr. Daulat Singh Kothari)亲自组建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起草《教育和国家发展报告》，把在若干大学建立专门的地区研究项目和中心，作为改进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一大建议。^②当前，印度各大学院校的地区研究中心和系所，除前述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外，基本上都是科塔里教育改革报告的产物。^③

1980年代初，“大学资助委员会”成立常设机构“地区研究顾问委员会”，专门管理全国高校中的地区研究项目。20世纪末以前，该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两条：一是把外语学习作为地区研究项目的重要内容，鼓励研究者学习所研究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二是资助实地调查研究，鼓励研究者同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建立密切联系。

1990年代以来，印度高校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快速发展。各地大学普遍开设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学科，地区研究或者单列为系所中心，或者在政治学系框架内设立专门项目，研究范围覆盖世界各地。

(二) 当前地区研究主要研究力量分布

印度学者认为，1950—1980年代，印度的地区问题研究在亚非拉居于领先地位，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学术力量。当前，地区研究在大学主要有两类载体：以地区研究命名的专门院系和中心，以及政治学系下设的地区研究项目组。

① 参见“大学资助委员会”官网，<http://www.ugc.ac.in/page/Mandate.aspx>。

②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4—1966*,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1970, 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第三卷), 可参见http://teindia.nic.in/Files/Reports/CCR/KC/KC_V3.pdf, 2016-03-04。

③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表 1 印度专门从事地区研究的院系和中心

所研究地区	地区研究机构的名称	所属大学
非洲	非洲研究	德里大学、孟买大学
	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	尼赫鲁大学
	法语非洲国家研究	尼赫鲁大学
	西亚和北非研究	尼赫鲁大学
亚洲	南亚研究	尼赫鲁大学、拉贾斯坦大学(斋普尔)、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瓦拉纳西)
	南亚和东南亚研究	马德拉斯大学(钦奈)、加尔各答大学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研究	斯里文卡塔斯瓦拉大学(Sri Venkateswara University)
	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研究	尼赫鲁大学
	中亚研究	尼赫鲁大学
	俄罗斯和中亚研究	尼赫鲁大学
	西亚研究	国立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阿里加尔穆斯林大学
	波斯湾研究	尼赫鲁大学
	巴基斯坦和西亚研究	加尔各答大学
	巴基斯坦研究	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
	尼泊尔研究	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
	西藏研究	国际大学(Visva-Bharati, 圣提尼克坦)
	中国研究	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国际大学
	日本研究	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国际大学
韩半岛研究	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	
欧洲	欧洲研究	尼赫鲁大学, 贾达伯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
	欧亚研究	孟买大学
	欧洲和拉美研究	国立伊斯兰大学
北美	美国研究	尼赫鲁大学
	加拿大研究	尼赫鲁大学, 巴罗达 MS 大学(the 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of Baroda)
拉丁美洲	拉美研究	尼赫鲁大学、果阿大学
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研究	国立伊斯兰大学、国际大学、马德拉斯大学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研究	国立伊斯兰大学

资料来源:本表所涉大学的官网。

从表 1 可以看出,印度地区研究的“地区”既有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地区,也包含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地区。后者如法语非洲研究、拉美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和伊斯兰研究等。近年来,一些设置在政治学系的地区研究项目已发展为相

关大学的品牌,乃至是印度地区研究领域的“明星”。(参见表2)

表2 印度政治学系的地区研究项目

政治学系下设的地区研究项目	所属大学
南亚	旁遮普大学(昌迪加尔)、朋迪切里大学、贾达珀大学、甘地大学(戈德亚姆)
东南亚	甘地大学
印度洋地区	旁遮普大学
中亚和西亚	旁遮普大学
西亚	朋迪切里大学
南极	旁遮普大学

资料来源:表中所涉大学网站。

印度有150多所大学设有地区研究机构、项目和相关课程,本文所能列举的只是极少数。印度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IS)是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者,它实力最强,不仅在国内位居首席,而且也是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声望最高的机构。

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有13个实体中心,^①研究地区包括:非洲、美国、拉美、西欧、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太平洋地区、俄罗斯、中亚、南亚、西亚等。其规模最大时有100多名研究人员,目前有教授40人,副教授27人,助教7人,共75人。除基础和实力雄厚以外,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国内享有特殊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培养了大量博士生和硕士生,输送到各大高校、智库、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因而实际是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摇篮。根据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官网的数据,截止2002年1月,它已经培养了527名博士和1734名硕士,主要分布在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②此外,它在1959年创刊的《国际问题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还是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展示的最重要平台,是向世界呈现印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① 13个实体中心分别是非洲研究中心、加拿大—美国—拉美研究中心、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中心、东亚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中心、国际政治—组织—裁军中心、国际贸易和发展中心、内亚研究中心、印度—太平洋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西亚研究中心。各中心具体情况可参见其官网:<http://www.jnu.ac.in/SIS/>。

② 有关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介绍,参见<http://www.jnu.ac.in/SIS/>,由这个数字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日期可见,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不够重视其网络的维护和更新。

二、印度地区研究的主要特点

大学面向大众提供高等教育,但1960年代初印度政府决定在大学普遍创设地区研究机构的初衷,是服务于国家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地区研究机构的的教学项目不是从本科生开始的,而是始于博士生和硕士生项目。印度国际关系学院(ISIS)独立存在时,只招收博士生。1970年并入尼赫鲁大学后,慢慢增设课程,逐渐扩大教学职能:先是延续博士生项目,后扩展到硕士项目,之后才联合尼赫鲁大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学等学科的师资力量,开设本科课程。印度大学的地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 地区研究同国际问题研究的关系微妙

从时间来说,地区研究先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而存在,1960年代地区研究机构基本建成。1980年代以前,印度只有地区研究,几乎没有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1987年,国际关系还不是独立的学科和专业,这一年阿帕杜莱教授在尼赫鲁大学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呼吁印度社科研究理事会(IC-SSR)“承认国际关系研究为一个学科”。^①

1980年代末,各大学陆续建立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问题研究同地区研究逐渐并列,慢慢显示出独立的倾向。21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要切断国际关系研究同地区研究的纽带,但目前还没有真正成功。关于二者的关系,印度学者当下的观点可分三种:(1)认为二者是统属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地区研究的组成部分,从属于地区研究;(2)认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是不同的学科。他们提出,地区研究一向重视文化/文明的作用;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则偏重政治和经济;(3)不置可否。他们认为,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学科,还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

不少学者试图用研究方法来重新定位国际问题研究,使之独立于地区研究。他们强调,地区研究以多学科方法为标志性特点,但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学研究。殊不知这使得争论更加复杂:如果国际问题研

^① 他的讲话后来公开发表。可参见 A. Appadorai,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No. 2, 1987。

究不同于地区研究,那么,它同国际关系研究、政治学研究又是什么关系?有学者认为,国际问题研究不能简化为国际关系研究,因为前者内涵更加宽广。另有学者提出,国际问题研究不属于政治学领域,因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政治学,尽管它一度属于政治学的次级学科,但这种学科定位已经不再合适。^①

可见,国际问题研究的某些学者原本试图脱离地区研究,获得新的身份和定位,现在却因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质疑者介入讨论,造成了某种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已不限于学者讨论的范围,一些大学的院系调整开始具体落实统分派的主张。锡金大学2008年在全球研究院(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开设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硕士项目,2013年项目更名为国际关系硕士项目,同时撤销全球研究院,新设“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硕士项目并入“社会科学学院”,与政治学无关。其反例则是2011年贾达珀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把已有51年历史的国际关系硕士生项目改名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项目。

因为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所以,学科专业的定位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这给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20世纪90年代,地区研究专业的学生就业状况不太好,有的大学该专业甚至一度不得不停止招生。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尼赫鲁大学地区研究专业的学生曾经常自称为“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21世纪,一些邦政府和司法部门也介入学科之争。比如,喀拉拉邦和加尔各答的高等法院分别在2007年和2012年裁定,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专业可以相互替代,拥有国际问题研究硕士学位的人有资格担任政治学专业的助教,反之亦然。但上述贾达珀大学的硕士生项目更名,原动力据说是来自西孟加拉邦大学服务委员会(College Service Commission)的一条政令,即不同意把贾达珀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等同于其他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②

^① A. P. Rana and K. P. Mishra,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and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dia: A Critique,” in K. Bajipai and S. Mallavarapu,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dia: Bring Theory Back Hom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5, pp. 14-16; V.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a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M. Algappa,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Vi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 1&2, 2009, pp. 7-36;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s Studies*,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 66-81.

^②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 66-81.

面对当前毕业生的就业困境,有研究者乐观地指出,21世纪印度的崛起可能给国际问题专业的学生拓展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随着恐怖主义、性别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升温,国际问题专业的学生可在全球范围内择业,而且这也是“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开始在各种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内在组成部分。^①毫无疑问,随着印度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它需要更多专门人才代表本国参与国际事务。不过,这在目前还只是一个美好的远景,画饼难以充饥。贾法尔的研究显示,当下印度各地的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大多拒绝接受国际问题研究的毕业生,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替各高等院校招募教师。^②

更广义地看,相近学科专业之间的尴尬关系在印度是一个普遍现象。查特吉曾指出,印度学术界的本位主义比较严重:“所有的学科各自为战,本位主义成为生存法则。”贾法尔发现,一个英语系或经济学系的本科毕业生要学习国际问题研究,或者政治学系学生要选修地区研究的课程,都会被认为“大不敬”(blasphemous)。^③这种总体环境不利于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长远发展。

(二) 地区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政府在学科的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即便不联系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单从历史经验来看,近现代地区研究在若干国家的发端和发展,都与现实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印度也不例外。印度地区研究的启动是基于同世界交往的需要。尼赫鲁直接推动了“大学资助委员会”的改组和正式成立。1955年德里大学设立国际关系学院和非洲研究系,与不结盟运动直接相关。而奠定当前学科基本布局的1963年、1966年“大学资助委员会”发展方案,则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直接产物,“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但人们都很清楚,这个动议直接源自1962年印度同中国边境战争的军事失败经历。那场战争使人们认识到,印度完全误读

①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 66-81.

② Ibid.

③ S. Chatterjee, “Global Windows,” *The Telegraph*, April 21, 2011;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 66-81.

了中国的事态和中国领导人的意图”。^①

“大学资助委员会”在各地大学普遍创建地区研究项目时，格外强调其政策性和实用性。根据1963年“大学资助委员会”报告，在大学建立若干地区研究机构的目标是服务于政策需要。“大学资助委员会”要求这些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联系，“研究该国/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深入研究印度与该国/地区的关系史。这是为了增强我们对特定国家/地区的了解，在政策问题上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些中心进行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制定双边、多边和地区合作层面的外交、国防和文化交流政策。这些中心应该保持相互间频繁互动，同时与政府相关部门（外交部、国防部、环境部、科学技术部等）保持密切联系”。^②

同国家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紧密联系，直接决定了印度地区研究的发展空间和路向。在较长时间里，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印度同其他国家的关系。^③ 不仅如此，巴杰帕伊和阿卜杜·贾法尔等学者认为，国家介入及其不合理干预，使印度的国际问题研究几乎没有独立的空间，批判性论著很难出现，因为同国家合作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隐形的理论基础”，即不加批评地接受的政治现实主义。^④

国家对地区研究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资源方面，包括资金、对外交流渠道、档案资料等。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直接控制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渠道，学者们很难自己寻找实地研究和对外交流机会。截至目前，印度依然是国家决定公布或不公布哪些信息，档案材料受到严格管制，国家还以安全和统一为名，禁止解密有关印度外交的重要文件。近几年，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问题。高塔姆认为，政府控制信息的体制，导致印度地区/国际问题研究者成为信息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贝赫拉的措辞更加激烈，他说，“印度政府利用信息资产实现了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殖民化”。^⑤

①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② Ibid.

③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 66-81.

④ K. Bajpai, “Obstacles to Good Work in Ind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 1&2, 2009, pp. 109-128;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66-81.

⑤ P. K. Gautam, “The Need for Renaissance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Modern War Studies,” *IDSA Occasional Paper*, No. 21, 2011, p. 16; N. C. Behera,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The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New Delhi: Sage 2008, p. 3.

“大学资助委员会”为地区研究设定的使命和任务是政策性和实用性，但这不等于国家政府、特别是对外交往的实际部门会自动采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平行的政府部门，“大学资助委员会”没有规范、约束外交部的权力。和许多国家一样，印度政府对国际问题学术性研究的关注微乎其微，政治家在决策时更看重的是来自于实践的知识和经验，而非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与外交实践的这种脱节，被阿卜杜·贾法尔称为学科发展的“实践障碍”。^① 不过，近年来，一些大学的地区研究机构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日益活跃。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2000年设立了对社会开放的系列讲座，主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地区动力学”(Regional Dynam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8年又进一步提出要增强自己在国家有关国际事务讨论中的“可见度”(visibility)，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参与国家的外交决策过程。^②

必须看到，“大学资助委员会”的规约是一回事，学者个人的追求是另一回事。在印度的地区研究领域，并非所有学者都尊奉服务现实政治、介入政策过程的使命。一些人宁愿远离政治，以学术本身为志业，同一个学者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可能有不同的追求，比如阿帕杜莱教授。根据后人的研究，20世纪40—60年代，阿帕杜莱在创建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担任印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期间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培养地区研究/国际问题专家、提升印度在国际问题领域的专业水平。^③ 但是，他晚年发表的讲话却明确反对地区研究以“介入政策”为目标。^④ 他认为，外交事务太过复杂，不可能委托给教授和学者，无论他们的学识多么渊博，学者的真正使命不是参与决策过程，而是观察现象、研究问题、提出建议和批评。对于美国式的旋转门，他承认外交实践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外交的属性，外交官如果决定在大学渡过后半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基于印度的实际情况，旋转门不大可能出现。

笔者还没有找到阿帕杜莱教授本人对印度无法形成旋转门机制的原因说明。结合其他资料来看，他所指的大概是政治制度，特别是计划体制和所谓

①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pp. 66-81.

② Hamari Jamatia, “JNU Think-tank to Aid Country in International Matters,” *The Indian Express*, Dec. 11, 2008.

③ M. S. Rajan, “Golden Jubile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 3&4, 2005, p. 195.

④ A. Appadorai,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No. 2, 1987.

“联邦精神”的平等主义的限制。比如,“大学资助委员会”在地区研究项目布局过程中,即决定在哪些大学建立地区研究学科、把哪些地区委托/分派给哪些大学等问题时,根本的指导原则是“联邦精神”,即联邦的团结和各邦的公平。这意味着各邦都要建立研究机构,资源要尽可能平均分配。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才形成了今天的布局:维斯瓦帕拉提大学(Viswabharati University)和德里大学研究中国、日本和西藏问题;阿里加尔大学研究西亚;德里大学和贾达珀大学研究巴基斯坦;贾达珀大学还研究东南亚;拉贾斯坦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研究南亚和东南亚,斯里文卡塔斯瓦拉大学研究印度支那半岛各国;孟买大学研究东非,德里大学研究非洲,孟买大学研究苏联和非洲等等。

“大学资助委员会”用来落实计划、规范研究方向和行为的主要工具是预算,它掌管着公立大学的教学行政经费和大部分科研经费。行政指令决定着地区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学校一般没有独立发展学科的自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各邦平等是一种政治理念,与学科专业基础这一客观学术条件之间往往不一致。面对这种状况,“大学资助委员会”的重点更多在平等,而不是如何确保有限资源本身价值的最优化。比如,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基础实力很强,但拉美研究只有一个职位,而1988年“大学资助委员会”决定在果阿大学创建拉美研究中心,设立10多个研究职位。^①1990年代初,印度推行自由化改革,很快在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但“大学资助委员会”至今还主导着印度大学中的地区研究学科及其发展。它以年度专家小组评估和巡视、考核结果等等作为依据,决定对大学的资金拨付,为学科设定发展标准。

印度的地区研究起初得益于计划体制的总体布局和大力支持,但随着学科的成长,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同计划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学资助委员会”长期使用的经费、学术标准、考核等规训学科发展的手段,正面临学者们的质疑和抨击。批评者主要着眼于“大学资助委员会”官僚化、武断分配有限资源等政策所带来的弊端。实际上,掌管高校资金部分资源的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已经官僚化,其结果包括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内,许多大学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项目都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甚至难以购买必需的资料文献,实地调研就更加困难。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初格外突出,当时印度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21世纪以来,印度总体经济状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① 根据果阿大学的学术成果统计表,拉美研究中心目前有10名研究人员,参见 <http://irgu.unigoa.ac.in/drs/handle/unigoa/31/browse?type=author>。

化,但大学资金短缺的现象却还在延续。贾法尔 2015 年的研究发现,“印度大学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包括报纸(印度和外国的)、官员和非政府发言人发表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文本、议会资料、政党的文件等等——几乎已成定则”。^①

研究资金和基础设施不足,在印度总体趋向自由化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正在悄然改变地区研究的某些细节。过去十多年,加拿大政府慷慨解囊,在印度的若干大学成立加拿大研究项目,加拿大研究由此在印度成为“显学”。这种资本导向的生长方式,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印度的不幸”,因为加拿大既不是世界大国,也不是印度的重要邻国,也不在印度传统的语言文化交往范围之内。^② 这种观点再次折射出印度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实用主义特性。

(三) 在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印度的地区研究更偏重现实问题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地区研究是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是经验和实证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己无关。贾法尔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忽视理论在印度已经“被制度化”。^③ 在笔者看来,重现实问题、轻理论研究,并非时间导致的变化,而是“大学资助委员会”为地区研究学科确定的基调。如前所述,“大学资助委员会”的地区研究指南明确指出,“虽然历史和理论研究是重要的,但重点应该放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面”。^④

关于理论研究偏弱的原因,印度学者的剖析大体可分为内因说和外因说两种。总起来看,“内因论”强调印度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特点,“外因论”强调国际政治理论的西方属性,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内在于西方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政治进程中。主要论点包括:(1) 印度文化缺乏“理论思考”的传统和习惯。当下社会也缺乏对理论的重视,理论研究被视为书斋式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工作,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的共谋;(2) 印度国父尼赫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尼赫鲁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天才和魅力,阻碍了学者的独立思考,他们没能

① M. S. Raja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 2 1994,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s Studies*,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 66-81.

②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③ Md. Abdul Gaffar, “The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Journal of People’s Studies*, Vol.1, Issue 1, August 2015, pp. 66-81.

④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成长为“自治共同体”，而是停留在补充尼赫鲁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层面。还有学者认为，尼赫鲁时代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同美国关系疏远，使印度难以融入西方主导的理论体系；(3) 历届政府的导向。认为印度政府历来鼓励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重视政策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阿查亚和布赞提出了一个说法，国际问题研究越是密切联系政府和外交政策机构，它就越少理论性；(4) 在建国初期的国族建设中，社会科学的预期角色是协助者，这意味着它要避免批判性的视角，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不具批判性的现实主义”(uncritical realism)；(5) 学科建设的缺陷。认为在大学教育中，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相关的专业教学没有教给学生必要的技能，甚至国际问题研究自身就缺乏“学科传统”，等等。^①

“缺少理论”的话题在印度的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已经热议了大约 20 年。关于它的负面影响，巴斯鲁尔认为，“抗拒理论”是印度地区/国际问题研究最大的障碍，因为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理论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V. 萨尼指出，由于对理论不够关注，乃至远离和贬抑理论，地区研究者缺少理论自觉，因而明显欠缺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ness)的能力，只满足于作为西方理论的消费者，满足于用印度或其他地区的经验事实来检验西方理论，他认为这是印度地区研究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一大瓶颈。他还指出，印度的地区研究不是理论驱动，也不是方法驱动，甚至不是问题和主题驱动，而是事件驱动。具体表现是，人们只关心和研究所谓热点，比如，美国总统访问印度，人们便蜂拥而上，印美关系的文章堆积如山，但这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它们如昙花一现，缺乏实质内容，没有长久根基。^②

在笔者看来，这种批判和反思其实本身就是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者的一种理论努力，是在以欧美理论大厦为参照系的背景下，对自我的严肃审视，其自我批评所体现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对“更上一层楼”的追求。其实，印度的地区研究并非没有理论成果，从战后初期的不结盟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发起的“世界秩序模式”研究项目，到 21

① K. Bajipai and S. Mallavarapu,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dia: Bring Theory Back Hom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5, pp. 17-38, 71-122; A. Acharya and B. Buzan, “Why There Is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6, 21.

② R. M. Basrur, “Scholarship on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Disciplinary Shortcoming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 1&2, 2009, pp. 89-108;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o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pp. 49-68.

世纪以来对于正义和秩序、主权边界(国家边疆)的研究等等,都有不俗的成就。^①把印度放置在非西方社会的背景中,它并非西方理论话语的庸俗消费者,而是已经成为理性的对话者,并已经有了成为生产者的自觉意识。

印度或许还没有建构起宏大的理论体系。其实,在当代,宏大理论本身正日暮西山。但印度地区研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贡献:不结盟运动。阿帕杜莱教授认为,“不结盟”是尼赫鲁和印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贡献。当然,任何理论问题总是萦绕着无休止的争论,“不结盟”的观念和实践在印度国内也有质疑者。怀疑其理论价值的人认为它缺乏清楚的概念界定。还有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不结盟在1950年代是成功的,那为什么在1970年代不再成功?^②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永恒有效的理论和范式;随着政治主体和现实环境的变化,理论需要不断调整以完善自身。正如另一位印度学者所言:“在后冷战时代,全球环境更趋复杂,各种行为体(从国家、国际组织到阶级、社会运动、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交流媒体等)以千差万别和盘根错节的方式存在和互动。这些复杂的过程和互动,呼唤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思路。”^③

从外部看来,印度在人类发展、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民族主义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然而,印度学者有几乎完全不同的评价,其核心还是印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自我定位问题,比如,S.马哈贾认为,印度的国际问题研究“在美

① 关于印度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大体脉络,可参见 S. Mallavarapu,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Tradition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nd Trajecto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 1&2 2009, pp. 165-183;关于21世纪以来印度学者对正义和秩序的研究,除阿玛蒂亚·森的作品以外,还可参见巴杰帕伊的著述,特别是他对尼赫鲁、甘地、印度教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四大思想的比较研究。Kanti Bajpai, “Indian Conceptions of Order/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hruvian, Gandhian, Hindutva, and Neo-Liberal,” in *Political Ideas in Modern India*, eds., By V. R. Mehta and T. Pantham, New Delhi: SAGE 2006, Vol.X, Part 7, pp. 367-390;关于印度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的述评,可参见 K. Bajpai and S. Mallavarapu,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dia: Bring Theory Back Hom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5。

② A. Appadorai, “Non-Alignment: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0, No.1&2, 1981, p. 3; A. P. Rana, “The Nehruvian Tradition in World Affairs: Its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to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ehru's Foreign Policy: Fifty Years On*, ed., By S. Mansingh, New Delhi: Mosaic Books 2003, p. 46; Shanti Swarup, “Non-Alignment, Mobilization and Capa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0, No. 1&2, 1981, p. 64.

③ Rajen Harshe and K. M. Seethi, eds.,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5, p. 5.

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没有得到充分表达”。^①他所引以为据的,主要是1998—2008年印度国内只有13名学者在10家全球发行期刊上发表论文、印度人的著作极少被西方大学的相关课程引用等等。S. 马拉帕拉普等人的关注点则是,2008年出版的《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没有收录任何亚非拉学者的作品,甚至连印度国内的地区研究当前有限的反思本身也是“变相的美国主导”。不过也有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按照当前正在兴起的“全球历史”“横向历史”或“相互联系的历史”观,人们不再可能孤立地书写一个国家的历史,殖民地也不是完全听任西方摆弄的受害者;这种历史观可以给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推动人们系统地探索文明之间的交融和激荡。^②

此外,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印度地区研究的学者大多专注于自己所研究的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比较研究还不多见。当然,就广度而言,印度的地区研究已经相当发达,每个地区都有若干学者在专门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地区研究者还主要是“专家”型,他们熟知自己长期关注的地区,却不太关心政治学理论问题,也几乎不跨越本地区的边界,极少围绕同一个重大理论或历史问题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

三、几点思考

印度的地区研究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历程大体相似,1960年代这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基本重叠的。北京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和亚非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的地区国别研究所,主要都是在1960年代初。^③ 印度地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特点和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或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存在。近年来,印度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也在经历觉醒和反思:这种觉醒不仅是理论的自觉,还包括唤醒本土传统思想文化、在本土思想文化同西方政治学、国际政治理论之间建立对话、参与塑造国际体系等一系列不懈努力。这些现象在中国学界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① Sneh Mahaj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Some Com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 1, 2010, pp. 59-72.

② S. Mallavarapu,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Tradition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nd Trajecto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6, No. 1&2, 2009, pp. 165-183.

③ 但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起步明显晚于印度。目前看到的说法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始于1978年,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真正的国际问题研究。参见 Sneh Mahaj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ia: Some Com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 1, 2010, pp. 59-72.

基于对印度地区研究的初步了解,结合中国时下地区研究的一些话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现实政治需要同既有国际学术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亚非拉国家而言,启动和加强地区研究是国家现实需要的自然表现,因为每个政权都有认识、了解、交往世界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地区研究作为一门先在的学科,已经形成一套规则。亚非拉国家的地区研究是降生在既有的国际学术体系中,这个学术共同体有它自己的评价体系。

于是便形成了亚非拉国家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双重导向:一是国家的国际生存和对外交往的现实需求,二是国际学术界既有的标准和规范。它们都是地区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和压力。但曾经有一段时期,特别是后冷战初期,中国和印度学界都热衷于强调“国际规范”,积极主动与之接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在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的同时,而不偏废地方知识、地方叙事的特性和必要性?如何认识作为学术规范的“普世原则”同孕育、生产该原则的地方文化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话语”属性?

从学科本身的发展来说,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现实需要与国际规范兼顾,即用让国际听众能明白的方式,伸张自己的利益,陈明观点,讲述地方故事、参与热点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讨论,增进沟通和相互了解,增信释疑。受文化和语言的阻碍,加上国际学术规范对国际社会“听众”的长期规训,一般而言,符合既有学术规范的方式是最容易被大多数国际社会听众接受的。但同时必须看到,国际规范自身不是自有永有的,规范都是人的设定。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而制定某规范,以及为什么要服从某规范,则是另一个话题。无论如何,规范始终处于不间断的更新和重构中。短期来说,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明白,我们需要遵从规范。长期来看,为了讲述者群体更大的方便,则可能需要参与塑造和更新规范。

现实政治需要与国际学术规范常常有矛盾冲突。机械地重复马克斯·韦伯的话也是容易的,即我们身处价值的万神殿中,任何一种视角/立足点必然带着特定的价值观、偏好或预期,但在研究实践中要保持韦伯式清醒却不太容易。比如,概念是学术规范的核心之一,同时也可能是话语体系的基石。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提出“失败国家”“脆弱国家”概念和指数(FSI)便是如此。它们每年对世界各国进行排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长期名列前10位,更是亚洲国家的前茅,这意味着它们是“失败国

家”的典型。这种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反恐战争期间政策的合法性。但是,在巴基斯坦,每年这个排名公布都会引发学者和政府的抗议。

(二) 加强跨地区比较研究

缺乏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印度和中国地区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也是地区/国际问题研究取得创新和突破的重大限制。基于单独的个案经验,几乎不可能得出有理论价值的成果。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往往是修正、更新、完善既有理论所必需的基础前提,也是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更高学术价值所在,即增进对人类社会自身和我们所处世界的认识。归根结底,理论的创立或更新,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随意修正,而是来自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深入研究。

跨地区比较研究需要团队合作,因为任何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没有人可以通晓每个地区。

(三) 地区研究需要多学科方法和实地调研,但不能把“多学科”作为唯一方法,也不能执念于“一手资料”

多学科和实地调研对地区研究的重要性,已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同时也要看到,在地区和国别研究中,固执于任何“唯一”都是严重的局限,通向知识宝藏的道路是无限多元的。地区和国别的社会结构、漫长历史,其民众的价值观和信仰,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同体内在的动力和进程等,都拒绝任何“唯一”。因此,不能把“多学科”和“一手资料”作为地区研究的唯一可行通道,甚至也不一定总是“最优”或“最佳”的入口。

多学科的组合本身便不是唯一固定的。研究者所接受的学科训练背景、研究任务本身所要求的学科知识,各不相同。在多学科组合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因时因地而异。

实地调研获取一手资料,是地区研究的生命力,由此形成的对一个社会和地区变化的记录和分析,也是地区研究的最高价值,因为它构成人类记录 and 了解自身存在这个无尽努力中的一个环节。但知识的积累是缓慢叠加的,实地调研不能取代文献研究。如果过分执念于实地调研,拒绝了解别人的任何观察和分析(文献资料),那么即便不讨论是否存在“巨人的肩膀”的问题,也是研究者对自己作为“个人”存在的有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再进一步,如果只推

崇实地调研而一概贬抑“二手资料”，那么我们自己实地调研的价值又何在？毕竟甲基于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对于任何非甲而言，都是二手资料。

（四）地区研究的自我反思和发展方向

20世纪印度地区研究的理论自觉大体有两个阶段：一是研究西方理论的各大流派，用这些理论来认识自己和世界；二是唤醒本土的传统思想，设法在现代理论与传统思想之间搭建桥梁，用印度的智慧和概念去阐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世界模式、正义、秩序等。这种理论自觉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涉及至少三个维度：其一，重构世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使之地方化；其二，用现代概念重构古老的本土政治思想和观念，使之在同西方理论对话的过程中恢复活力与生机，并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思想；其三，参与重构国际关系理论，使之多元化。在这三个维度的重构过程中，印度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对印度的了解已经并将持续发生变化，最终完成印度同世界关系的重塑。

当前印度的理论反思和重构还没有完成。尽管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地区研究领域，极少有人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工具来审视国际学术界的评价体系。和中国一样，印度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了国际学术界的评价体系，转化为两国学界自我规训的原则。中国和印度学者都希望跻身于国际学术界的中心舞台，希望研究成果能得到西方承认，等等。

学术界的这种努力和现状并非独立于国家的世界处境。恰恰相反，它们是国家国际地位现有状况的体现，是实际地位提升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其继续提升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关“全球南方”的地区研究进入“国际竞争”的客观历史进程和主观意象之形成，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从现象来看，印度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已有建树，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但它的学者没有满足于现状，批判性越来越强。他们有远大志向，要更多参与国际讨论，要在世界重要刊物上发出更强大的印度声音，要把地方知识/叙事变成分析全球问题的主流框架。这其中体现的不仅是锐气，更是地区研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是重塑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一种努力。